

中国政党制度发展道路：溯源、挑战与展望

许奕锋

摘要：中国政党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融开创性、兼容性、统一性于一体，在当代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大潮中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指导，充分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得以产生和发展。这一伟大政治创造秉承了天下为公、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衷共济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既创造了中国发展的奇迹，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发展的政党制度密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理论、中国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提升中国政党制度的文化软实力和国家治理效能，这些成功实践和创新发展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和世界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中国政党制度；发展道路；溯源；话语体系；展望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 (2022) 01-0042-06

中国政党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是在当代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大潮中产生和发展的。这一伟大政治创造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指导，充分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由多党合作建国、协商民主建政而产生的，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不断得以发展和完善。实践历史充分证明，中国政党制度是成功的、有效的且充满生机活力的，也必然会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政党制度的成功实践与创新发展，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为世界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和启示，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溯源

追溯中国政党制度的思想之源，既要从理论角度看其发源，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重

要论述中找到其理论依据，揭示中国政党政治的哲学依据、基本原理、理论基础等，也要从实践角度追寻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世界各国政党政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深入探索中国政党制度发展的现实源头和成功经验。

（一）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溯源

中国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在《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关于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等著作中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联合其他工人政党建立联盟，“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保证”。^[1]要求各国共产党人“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2]明确指出共产党必须同其他政党建立多

党合作关系。在欧洲，工人运动出现了很多派别，比如伦敦工人会、四季社、蒲鲁东派、魏特林派、土地改革派等，这成为共产党在如何处理好与工人政党关系上摆脱不了的现实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经过深入考察之后明确指出，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对这些工人政党采取的正确态度就是要团结合作，壮大革命力量，共同进行革命斗争。^[3]之后经过详细分析英国、法国、瑞士、波兰等国家的阶级斗争状况，主张由“实现有原则的团结合作”到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作为提出在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实行多党合作理论思想的第一人，列宁结合苏联实际，创立了多党合作理论，论述了多党合作的阶级基础、政治基础、策略遵循等多党合作基本理论。^[4]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创新发展，创建了中国特色的政党理论。从1938年第一次提出“同盟者”的思想，指出要善于和同盟者一道工作，到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强调指出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战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从抗战时期探索建立的“三三制”政权，要求在政权中中国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到首次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予以明确政党关系，其后又在实践发展中增加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内容，一定意义上在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史上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政党关系，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多党合作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二）中国政党制度的实践溯源

在多党合作的实践尝试方面，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十分重视布尔什维克党与其他革命政党的联合，设想一起“分掌政权”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在内政外交等诸多事务上，列宁曾经想争取同社会革命党的合作，同少数派孟什维克合作，甚至为了能够赞成国家资本主义想争取资产阶级各个方面的合作。但是，由于当时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正遭到十四个国家的武装干涉，同时又进行国内战争，俄国资产阶

级和其他党派都敌视苏维埃政权，只剩下一个俄国共产党继续把十月革命的胜利坚持下去，因此在苏联就没有完全实现列宁提出的多党合作的设想，不得不转向“一党专政”，强化了党的一元化领导。^[5]在中国，政党制度由多党制模式到两党合作模式到一党专制模式，再到一党领导多党合作模式，经过了一个否定到否定的不断试错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历经劫难、屡次试错后最终作出的坚定而又慎重的历史选择。

在政党制度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合作就领导权问题上发生过或“左”或右的错误，也汲取了不少教训。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完全听信共产国际，只讲统一不讲独立，只讲协同不讲斗争，放弃了对革命和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只注重宣传工作，忽视武装力量，这成为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等采取“左”倾关门主义，因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主要敌人缩小了统一战线范围，因要求共产党一切服从国民党破坏了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这给予我们现实启示，即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独立领导，多党合作只有靠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才能取得最终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因为逐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各种革命力量的核心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经过斗争、较量、权衡之后自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烈响应“五一口号”，中国政党制度得以正式确立。此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携手前行的几十年实践，生动诠释了中国政党制度的伟大独创性和强大生命力。

二、中国政党制度在坚持和完善中面临的现实挑战

从国际政治生态来看,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因掀起所谓的“民主化”浪潮整体上趋向于或改为多党制。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复杂的分化斗争,中国政党制度从来就是在西方势力就政党制度问题上的移植、复制、争辩、较量、博弈中得以产生和发展并不断坚持和完善。同时随着国内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执政基础、执政压力、执政绩效与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其参政基础、参政压力、参政绩效等等,在新形势、新条件下都发了巨大变化,也面临更高的时代要求。

(一) 面临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挑战

伴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成就和中国经验举世瞩目。当下的中国已不再是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旁观者,不再是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在世界发展领域的话语权不断提升。但是从观念层面和理论研究层面,总是有人感到底气不足,习惯于使用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政治现象,甚至有意无意用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剪裁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6]很长一段时间,西方把控着政党制度分类的理论话语权,有迪韦尔热按照政党数量把政党制度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有萨托利根据政党得票率、统治潜力以及意识形态等标准把政党制度分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等等,这无疑都不同程度地成为从舆论上指责、批判和攻击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工具。^[7]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提出,为政党制度的划分提供了新的分类标准,突破了西方政治制度的理论困境,也冲破了西方政党制度的理论陷阱,实现了政党数量在“一”与“多”的有机结合,实现了政党关系在“竞争”与“合作”的有机整合,在中西政党制度比较中定新旧,在国家治理中的中西政党制度效能比较中分优劣,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政党制度发展中的制度自信。

(二) 面临提升政党制度效能的挑战

首先体现在参政党建设上。在新型政党制度格局中,参政党基于多党合作的“生态平衡”如

何实现自身的协调发展,既要考量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方面和奋斗目标上的一致性,也需要从政治角色定位找准自身的政治生态方位,还要考量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之间的组织特性,在成员发展和组织建设注重避免“成员构成趋同”以保持各自鲜明的界别特色。^[8]从目前成员发展来看,整体上各民主党派的界别特色呈现出动态化特征,既有各民主党派原有界别覆盖面出现缩减趋势,也有在新的行业新的领域发展成员的现实。各民主党派发展面临一个新的课题,既要立足自身界别特色又要发展合适对象以履行好参政职能,最大限度避免政治资源内耗与浪费,提高参政党履职能力和水平。

其次体现在制度规范上。从实践层面来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的耦合性不断增强,政治制度效能不断得以提升。中国政党制度效能要进一步提升,需建立并细化相关配套制度规定。以政党协商为例,如何在遵循“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直接进行政治协商”这一原则性要求作出细化安排,就需要针对“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在程序和环节的具体“度”上进行制度化规定,以建构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政党协商流程。

再次体现在整合功能上。总体而言,中国政党制度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日趋复杂,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变量相互交织且相互作用,形成了多元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国政党制度既面临外部世界各种政党类型的影响甚或冲击,也面临着如何积极应对国内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利益整合压力,通过政党制度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将社会各种非稳定性因素和挑战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动力和社会治理的活力。

(三) 面临夯实制度理论基础的挑战

有研究认为,中国政党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打破了世界政党政治的西方话语霸权地位,也破解了政党关系陷于冲突、倾轧、攻讦和对立等造成消耗资源与推高政治成本的世界性难题,创造了世界民主政治的崭新实现形式。^[9]需要深入发掘中国政党制度的文明内涵,实现大一统传统政治

文化创造性转换的文化阐述。也需要充分研究中国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或从利益代表、政治功能、制度效能,或从政党关系、民主路径、政治制度等不同视角阐释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和优势,更需要夯实好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石。从马克思、恩格斯多党合作思想,列宁多党合作思想与探索,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以及历届中共领导人关于多党合作的重要论述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中国政党制度理论,建构系统全面的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我们亟需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哲学根基和方法论基础,从基本原理层次就政党制度性质、发展方向、政党关系模式、政党政治结构以及政治运行状态等方面深入建构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根据或理论基石,为世界政党制度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三、中国政党制度之于民主政治发展的未来展望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伴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政党制度也进入了新时代。中国政党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国民主政治的优势、作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胸襟、智慧和自信,有其历史发展演进的必然规律。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以全球眼光拓宽理论视野,准确把握世界政党制度普遍性与中国政党制度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创新拓展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的法治规范,提升中国政党制度的文化软实力以及发挥中国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效能。

(一) 构筑政党制度创新理论,创建多党合作话语体系

政党制度的话语权,是靠实实在在的国家发展成就或国家治理成效得以确立的,既要遵循话语体系建构的内在逻辑,通过其现实作用力和潜在影响力建构其体系的系统性、科学性与合理性,同时也需要遵循政党制度发展的历史规律;既要尊重既有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和充分借鉴不同政党制度发展经验,也要在认真总结中国政党制度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推敲、论证、架构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关于性质、结构、功能、规则、运作等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体现的是世界性和现代性,绝

不仅仅是自循环的封闭式话语体系。^[10]西方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在政治实践中呈现了政党之间的政治恶斗、权力掣肘下的行政效率低下等现实困境。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员马丁·雅克曾感慨地说,

“西方国家的长期论点是,多党制是民主的一大优势,能够防止政党僵化和停滞。然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使自己保持活力与年轻的方法,而西方的政党却越来越疏远其代表的人民”。^[11]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不是要全盘否定西方既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而是在充分借鉴世界不同政党制度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反复论证、科学凝练并在中国实践中逐步推进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逐步创建既能适合中国国情又能具有世界参考价值的多党合作理论话语体系和制度话语体系。中国政党制度的坚持和发展,要有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域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结合起来,成为世界政党制度发展的“文明之光”和制度镜鉴。

(二) 遵循政党政治法治规律,推进政党制度法治规范

政党制度是近现代民主政治的载体和形式,与法治模式密不可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12]这就意味着现代政党制度需要遵循法治规律,遵循法治思维和方式,为政党政治提供稳定可靠的制度保障。以中国政党制度有关阐述为例,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与西方国家政党因选举而执政不同,而是来源于革命取得成功和改革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也来源于宪法直接赋予其执政合法性并明确确认其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地位和参政权同样受到宪法和有关制度文件的保护和确认,特别是其作为一项国家制度在宪法和政协章程中都有明确规定。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确认了中国政党制度的政治法律地位。2018年第五次修订的宪法明确表明“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

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13]明确了各政党在中国法治中的职责。2018年全国政协十三届第一次会议修订的政协章程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进一步彰显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也在法理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秩序框架和行为准则。^[14]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应遵循法治和政党法治的一般规律，构筑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政党政治格局。从政党政治法治方向上来看，如何从法治角度进一步确认中国政党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定位、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和职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组织形式和执政法律程序等方面，需要从法治技术方面给予立法支持，使得中国政党制度在政党权力的运作、政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政党与政党、社会等多边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得以法治层面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体现。

（三）塑造政党政治文化生态，提升政党制度文化实力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种政治文化是在该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形成的。^[15]一个稳定的政党制度，离不开该社会政治文化的塑造，其一定的政治制度规范源于特定的政治价值、政治心理和参与政治社会的基本方式。从政治发展的考察来看，政治文化对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也是政党制度运作乃至变迁的深层次因素。传统的政治文化元素诸如宗法观念、家长制、任人唯亲、特权思想等制约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实现程度，需要从国家一统、崇尚权威、以人为本、贵和尚中文化元素中实现大一统传统政治文化对于中国政党制度上的创造性转化。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国的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且不断加强，政治文化在交流交往和代际传递中发生着难以逆转的新变化，追求自由、制约权力、多元开放、和谐理性、包容差异等理念越

来越成为一种时代崇尚，这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变化。中国政党制度的价值实现，可以秉持大一统的政治理念，立足于整体至上的政治价值取向，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突破西方政治文化中竞争、制衡的民主困境，以协商建构和优化合作型的政党政治关系。可以以培育民众的政治意识和公民意识作为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基础，以凝聚社会各个方面对中国政党制度的价值共识作为政党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为平台，通过规范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程序性安排，培育有序表达、包容妥协的公共意识，以良好的政治参与心理、理性的政治参与行为、合作的政治参与效能展现中国政党制度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力。

（四）坚定政党制度发展定力，发挥政党制度效能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所针对的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执政党制度开始发难，打造舆论，大肆渲染，把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打入另类，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16]坚定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定力，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其重要而关键的环节。中国政党制度从多党合作、协商建国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从“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到“执政与参政、领导与合作”，经历了定向、定性、定型、定位以及定论与深化的过程，^[17]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政党制度模式，实现了集中领导和发扬民主、有序参与和充满活力的有机统一，以举世瞩目的实践成就彰显了无与伦比的优越性。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一个现代化中的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18]中国政党制度的坚持和发展，最为根本的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能力发挥举旗手、定盘星的执政党作用，不断汲取人类优秀政治文明成果，认真学习和借鉴世界政党政

治理论与实践中的合理因子,展现“中国气派、中国智慧和制度自信”,不断推进我国政党政治的制度化 and 规范化建设,并以崭新的政党制度、和谐的政党关系、独特的执政方式、新颖的民主形式为世界政党制度乃至人类社会民主政治文明提供中国方案和贡献中国智慧。

总之,中国政党制度既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吸纳了世界文明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期探索实践的智慧结晶,具有浓厚的中国元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19]中国政党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既需要坚持中国政党制度的精神实质以及好的做法,不断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也需要清醒认识到中国政党制度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经受来自各方的挑战,不断完善中国政党制度以推动其不断向前发展,以巨大的实践成就彰显中国政党制度创造性的世界意义。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1.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7.
- [3] 吴励萍.中国政党制度的思想渊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党合作的理论[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 [4] 吴棉国,刘小利,申家驹.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思考[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4).
- [5] 孙林.习近平新型政党制思想的历史基础和时代意义[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8,(5).
- [6] 袁莎.传承与超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明价值和意义[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5).
- [7] 孙林.习近平新型政党制度思想的历史基础和时代意义[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8,(5).
- [8] 魏晓文,苏杭.新时代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及功能优势[J].理论探讨,2018,(6).
- [9] 白清元.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J].团结,2018,(6).
- [10] 虞崇胜.亟待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8,(5).
- [11] 钟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带给世界的启示[N].人民日报,2018-03-10(03).
- [12]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新华网,2015-02-02,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2/02/c_127449928.htm.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EB/OL].共产党员网,2018-03-22,http://news.12371.cn/2018/03/22/ARTI1521673331685307.shtml.
- [14] 程红.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J].北京观察,2018,(8).
- [15] [美]加布理埃尔·A·阿尔蒙德,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8.
- [17] 赵大兴.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J].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19,(1).
- [18]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41.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0.

作者:许奕锋,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党外代表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湖南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钟晓媚